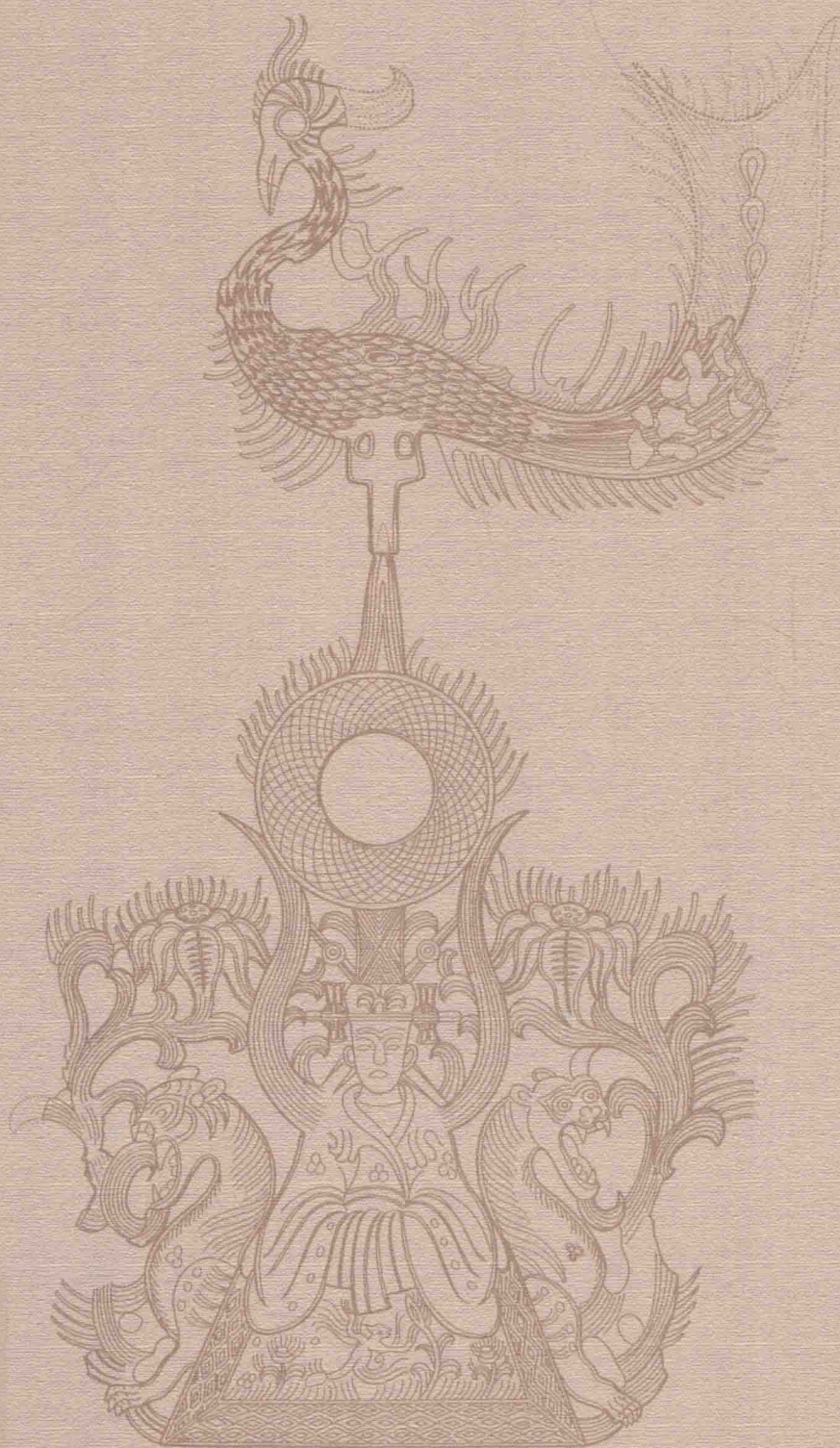


涪江 遗珠

绵阳可移动文物

绵阳市文物管理局 绵阳博物馆◎编著
王锡鉴◎主编 唐光孝◎副主编



科学出版社



涪江 遗珠

绵阳可移动文物

绵阳市文物管理局 绵阳博物馆◎编著
王锡鉴◎主编 唐光孝◎副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首部全面介绍绵阳市可移动文物的公开出版物，以收录全市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清代以前学术性较高、观赏性较强的历史文物为主，按漆木器，铜铁器，陶器，瓷器，石器、石刻、画像砖，书画以及杂项分类，以图为主、图文并茂，对全市国有可移动文物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梳理和研究，全面反映了全市国有可移动文物的概貌、重点、特点和价值，具有较高的学术性、资料性和科普性。

本书可供从事考古、历史、文物、美术研究的专家学者、教师、学生及文物收藏爱好者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涪江遗珠：绵阳可移动文物 / 王锡鉴主编；绵阳市文物管理局，绵阳博物馆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7

ISBN 978-7-03-045302-0

I. ①涪… II. ①王… ②绵… ③绵… III. ①文物—介绍—绵阳市 IV. ①K872.7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6083号

责任编辑：柴丽丽 / 责任校对：彭 涛

责任印制：肖 兴 / 装帧设计：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7月第 一 版 开本：889×1194 1/16

201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6 3/4

字数：480 000

定价：3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序

涪江润沃土，富乐出绵州。

涪江，这条发源于岷山主峰雪宝顶的河流，流域面积几乎覆盖绵阳全境。千百年来，滔滔的涪江水润泽了绵州的土地，滋养了绵州的文明，催生了“富”、“乐”绵州。

绵阳古称涪县、绵州，后因城址位于绵山之南而得名“绵阳”。这里境域辽阔，资源丰富，历史悠久。2万~3万年前，绵阳的先民就在这里生息繁衍。5000多年前，他们就开始过着定居的生活。秦汉以降，绵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至迟在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就设置了涪县。及至三国蜀汉，绵阳成为富、乐之乡，并自西晋开始，成为历代州郡治地和一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千百年来，绵阳人一直依偎着涪江辛勤耕耘，创造了辉煌的历史，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可移动文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绵阳市、县国有文博机构通过考古发掘、社会征集、公安部门移交等途径，收藏了7万余件文物，其中，三级以上珍贵文物达5300余件。文物种类包括石器、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漆木器、金银器、石刻、画像砖、书画、碑帖、民族文物、红军文物和“5·12”汶川特大地震文物资料等，时代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至现代。这些文物中，以人体经脉漆木俑和车、马、人物造型为代表的一批漆木器独具特色，它们是四川地区迄今为止数量最多（500余件）、个体最大、种类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一批西汉漆木器，特别是人体经脉漆木俑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2件有关经脉学的人体模型之一，其价值和意义“堪与北京猿人媲美”；以东汉铜马和摇钱树为代表的青铜器，工艺精良，造型俊美，虽为青铜时代的暮年之作，依然闪耀着耀眼的艺术光芒；以娱乐俑、劳作俑、动物俑为代表的汉代陶塑，不仅见证了汉代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也是当时全国高水平的陶塑艺术品；近2000件的青瓷器，表明绵阳是四川出土青瓷器最多的地区，其中，一件西汉青瓷壶，是迄今四川发现最早的原始青瓷器，对研究四川瓷器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宋元明清，绵阳国有馆藏数量最多的是瓷器，其中，青花菊花纹象耳垂环瓶和青花缠枝牡丹纹鼎式炉是四川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仅有的2件元代青花瓷器，弥足珍贵；20世纪六七十年代，郭沫若、谢无量、傅抱石、吴冠中、李苦禅、潘天寿、蒋兆和、林散之、沙孟海、陆俨少、贺天健、钱松喦、王叔晖、王雪涛等一批现代大家为江油李白纪念馆创作的一批李白诗意书画作品在全国独领风骚……这些可移动文物与绵阳47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犹如涪江历史长河中的晶莹浪花，数千年奔腾不息，汇聚成现代绵阳珍贵的文化遗产。

为了保护、继承、弘扬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组织编撰了《涪江遗珠——绵阳可移动文物》。本书是去年出版的《涪江遗韵——绵阳不可移动文物》的姊妹篇，也是第一部全面介绍绵阳市国有可移动文物的公开出版物。本书第一次对全市国有可移动文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和研究，以收录清代以前学术性较高、观赏性较强的历史文物为主，按漆木器，铜铁器，陶器，瓷器，石器、石刻、画像砖，书画以及杂项分为七类。具体内容的编撰以图为主、图文并茂，由“概述”和195个条目组成，力求反映全市国有可移动文物的概貌、重点、特点和价值，期望达到学术性、

资料性和科普性兼顾的目的。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社会文明的结晶，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在本书即将付梓的时候，我们欣喜地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文物保护的重要论述，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进入了新时期，让人倍感鼓舞！希望本书和此前出版的《涪江遗韵——绵阳不可移动文物》一道，能够为绵阳人民认识家乡文物、热爱家乡文物、保护家乡文物尽到绵薄之力，能够为继承家乡历史、传承中华文明尽到绵薄之力，能够为弘扬家乡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文化尽到绵薄之力。

王锡莹

2015年1月于绵阳

目 录

概述

壹 漆木器

汉代人体经脉漆木俑·····	012
汉代木胎漆马·····	014
汉代骑马木俑·····	015
汉代驾驭木俑·····	019
汉代立侍木俑·····	020
汉代立侍彩绘木俑·····	021
汉代龙凤纹漆竹饰件·····	022
汉代木牛·····	023
汉代夹纻胎漆洗·····	024
汉代木胎漆圆奁·····	025
汉代木建筑模型·····	026
宋代鎏金木雕道教坐像·····	027
宋代鎏金木雕道教捧笏坐像·····	028
明代鎏金木雕道教拱手坐像·····	029
明代鎏金木雕道教拱手立像·····	030
清代木斗·····	031

贰 铜铁器

战国虎纹铜戈·····	034
战国铭文铜戈·····	035
战国铜剑·····	036

战国铜剑·····	037
战国铜钺·····	037
汉代铜马与牵马俑·····	039
汉代摇钱树·····	040
汉代摇钱树·····	044
汉代铜佛像摇钱树·····	046
汉代摇钱树·····	048
汉代铜熨斗·····	050
汉代带盖提梁铜壶·····	051
汉代蒜头铜壶·····	052
汉代蒜头铜扁壶·····	053
汉代带盖铜壶·····	054
汉代双耳铜釜·····	055
汉代“青羊”铭文神兽铜镜·····	056
汉代龙虎铭文铜镜·····	057
汉代仙人神兽铭文铜镜·····	058
汉代柿蒂纹铜镜·····	060
三国曹魏铭文纪年铜弩机·····	061
六朝铜焦斗·····	063
唐代葵花铜镜·····	064
唐代瑞兽葡萄纹铜镜·····	065
宋代葵花凤凰纹铜镜·····	066
宋代带柄仙人铜镜·····	067
宋代铜象棋·····	068
宋代铜瓶·····	069
明代鎏金铜观音·····	070

明代鎏金铜喇嘛	071
明代老子骑牛铜像	072
清代欢喜铜佛像	073
清代景泰蓝铜瓶	074
清代铜胎花瓶	075
近代铜号	076
汉代龙首柄铁鏃斗	077
汉代环首铁刀	079
汉代铁钩镰	080
汉代铁提梁三足熏炉	081

叁 陶器

汉代彩绘陶俑	084
汉代说唱陶俑	085
汉代舞蹈陶俑	086
汉代插花陶俑	088
汉代彩绘抚琴陶俑	090
汉代捧笙陶俑	091
汉代抚耳陶俑	092
汉代庖厨陶俑	093
汉代陶侍俑	094
汉代提罐陶女俑	096
汉代击鼓陶俑	097
汉代劳作陶俑	098
汉代西王母神兽陶灯	100
汉代西王母陶灯	101
汉代虎形辟邪陶器座	102
汉代陶鹅	103
汉代陶子母鸡	104
汉代陶鸡	105
汉代卧姿陶狗	106

汉代站姿陶狗	107
汉代陶猪	108
汉代陶马头	109
汉代铜盖陶罐	110
汉代带盖陶罐	111
汉代双耳三足陶釜	112
汉代龟形陶摇钱树座	113
汉代神兽陶摇钱树座	114
汉代陶水田	115
汉代陶井	116
汉代彩绘陶房	117
六朝提桶陶小女俑	118
六朝陶牛	120
六朝陶羊	121
宋代三彩双头文吏陶俑	122
宋代三彩人首蛇身陶俑	124
宋代三彩戴枷陶俑	125
元代彩绘武士陶俑	126
明代釉绘彩陶童棺	127
明代大彬制款紫砂壶	128
明代大彬仿古款莲子紫砂壶	129

肆 瓷器

汉代青瓷壶	132
六朝青釉莲瓣纹盘	133
六朝青釉鸡首壶	134
六朝黑釉鸡首壶	135
六朝青釉六系带盖罐	136
隋代酱釉罐	137
唐代邛窑青釉双耳执壶	138
五代“官”款三莲瓣口白瓷碟	139

宋代吉州窑黑釉剪纸贴花碗·····	140
宋代青釉水涛纹碗·····	141
宋代影青印花碗·····	142
宋代影青印花斗笠碗·····	144
宋代影青梅瓶·····	145
宋代梅青莲瓣纹碗·····	146
宋代三彩瓷枕·····	147
元代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碗·····	148
元代粉青出戟尊·····	149
元代粉青双耳垂环瓶·····	150
元代龙泉窑豆青吉字瓶·····	152
元代青花菊花纹象耳垂环瓶·····	154
元代青花缠枝牡丹纹鼎式炉·····	156
明代万历款青花缠枝莲花纹碗·····	157
明代青花杯·····	158
明代青花人物山水笔筒·····	159
明代蓝釉高足杯·····	160
明代龙泉窑青釉八棱盏·····	160
清代青花花卉龙盘·····	161
清代五彩花鸟高足碗·····	162

伍 石器 石刻 画像砖

新石器时代晚期石箭镞·····	166
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凿·····	166
商周石璧·····	167
汉代银缕玉衣片·····	168
汉代玛瑙环·····	169
汉代玛瑙环·····	170
汉代绿玉璜·····	171
唐代石刻墓志·····	172
宋刻颜氏干禄字书碑·····	174

南宋孔子圣象碑·····	178
宋代石刻经幢·····	180
宋代八棱柱石买地券·····	182
宋代石欽砚·····	183
宋代李白醉酒石雕墨洗·····	185
元代赵府君墓碑·····	186
明代石翁仲·····	188
明代石刻人物香炉瓶花·····	190
明代石雕彩绘飞天·····	192
清代石雕滚龙抱柱·····	193
清代石雕八仙柱·····	194
清代石刻菊花双鸟瓶·····	195
清代石雕人物花碑前檐·····	196
汉代车马出行画像砖（一组）·····	198
东汉“元和二年”纪年铭文砖·····	201
汉代“居人吉利”铭文砖·····	201
汉代“吉人八千万”铭文砖·····	201
汉晋仙人逐马画像砖·····	202
汉晋西王母画像砖·····	202
汉晋神树人物画像砖·····	203
汉晋木连人物画像砖·····	204
汉晋凤鸟画像砖·····	205
汉晋子母凤鸟画像砖·····	205

陆 书画

元代倪云林《幽亭秀木图》·····	208
明代沈周《秋山图》·····	210
明代仇英《亭台楼阁图》·····	212
明代杨慎摹王羲之《十七帖》残本·····	214
清代傅山行书《左思·咏史十条屏》·····	216
清代王翬《山水图》·····	218

清代查士标《山水图》·····	219
清代石涛《山水册》·····	221
谢无量《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222
郭沫若行书《酌酒·倚剑联》·····	223
张大千《宋人宾头庐尊者渡水图》···	224
张大千《太白行吟图》·····	225
傅抱石《李白像》·····	226
于右任《杜甫诗二首》·····	227
李苦禅《白鹭图》·····	228
蒋兆和《李白像》·····	229
贺天健《李白梦游天姥吟图》·····	230
潘天寿《写李青莲海榴世所稀 诗意图》·····	232
林散之草书《哭宣城善酿纪叟》·····	233
吴作人《大鹏图》·····	234
吴冠中《峨眉山月思李白》·····	235
沙孟海行草《江上吟》（节句）·····	236
陆俨少《蜀道难诗意图》·····	237
钱松喆《登金陵凤凰台诗意图》·····	238
王雪涛《牡丹蝴蝶图》·····	239
王叔晖《夜宴桃李园图》·····	240

柒 杂项

汉代金手镯·····	244
宋代荷花纹银碗·····	244
宋代折枝石竹纹银盘·····	246
宋代靖康元宝·····	247
明代联珠金手镯·····	247
明代镂雕人物楼阁金发簪·····	248
明代镂雕叶形人物楼阁金钿·····	250
明代鸳鸯金胸佩·····	252
清代题款象牙笔筒·····	254
清代象牙木雕摆件·····	255
清代犀角杯·····	256
清代人头皮鼓·····	257
白马藏族妇女钱币腰带·····	258
白马藏族妇女鱼骨佩饰·····	259

后记

概述

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绵阳，亘古涪江水系自西北向东南顺势而下，激荡、冲刷、堆塑出山地、丘陵和平坝三级自然地貌，被称为中国地貌的典型样本，也是探讨人地关系的绝佳剖面。在这块土地上，涪江串起了分处三级地貌上的平武、江油、绵阳和三台四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北川、安县、梓潼、盐亭、涪城、游仙等县区，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体现出鲜明的历史个性和地域特色。

（一）

早在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古人类活动在北川县高山地区的洞穴中^[1]。到距今5000年前后，绵阳先民顺江而下，攀越高山，蜗居江油大康镇吴家后山大水洞^[2]，扎寨安昌江边的涪城新皂镇边堆山^[3]……他们渔猎农耕，点燃文明星火，让袅袅炊烟在涪江上空飘荡、弥漫。它们是上续岷江上游地区的营盘山文化，下连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桥梁之一，是探索和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传播，族群形成、迁徙和交融的重要节点。

夏商周时期，绵阳大地1800余年的历史面目朦朦胧胧，藏头露尾，莫测深浅。盐亭麻秧乡窖藏出土殷商时期礼天祭祀的苍璧，涪江沿岸出土的东周晚期巴蜀与中原式青铜戈、剑、钺、矛等兵器，印证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一历史时期，绵阳处在巴蜀奴隶制国家的社会形态之中，但斑斑点点，难窥全豹。

（二）

秦扫六合、强汉迅现，历史的车轮驶上了秦汉帝国的直道驿路。这时，绵阳纳入一统，始设县置郡。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在今绵阳地区逐步设置或领有部分区域的葭萌、郪、梓潼等县，归属秦王朝之蜀郡。公元前201年，汉置广汉郡，治今梓潼，下设涪县。585年，隋朝始称绵州。1913年，民国政府改称绵阳。无论县治还是州府，其治地绝大多数时间都设于今绵阳主城区。

公元前4世纪晚期，秦朝结束了列国纷争的局面，汉代进一步完成文化整合，奠定多民族国家的基础。这时，中华民族的核心——汉民族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和强盛的起点，奔腾不息的涪江则迎来了绵阳经济、科技、文化和艺术发展的第一波高峰，尤其是在金属器铸造、漆木器手工业、医学科技和陶塑艺术等方面独树一帜，领时之先。

《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治地在今梓潼城北的广汉郡“有工官”，是当时全国八大工官之一，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市博物馆、北川县文物管理所：《四川北川县烟云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6期。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市博物馆、江油市文物管理所：《四川江油市大水洞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6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四川绵阳市边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0年第4期。

以生产金银器和漆木器著称全国。《汉书·贡禹传》载,“蜀广汉主金银器”,说明当时广汉郡工官铸造的铁和铜等金属器是其重要产品类别之一。2007年,四川广汉市石亭江出土1件铸有汉武帝太始元年(前96年)造的“广汉郡雒江桥墩”,铁质,重达近1.4吨,完好如初^[4]。罗振玉《贞松堂吉金图》著录的几把汉代蜀郡和广汉郡铁器制品——书刀,其中3件明确为卅炼的广汉郡工官产品,它们分别为“永元十六年,广汉郡工官,卅涑△△△△△△△△史成、长荆、守丞、熹主”;“永元十△年,广汉郡工官卅涑书刀,工冯武……”;“……广汉[郡工官]卅涑△△△秋造,护工卒史克、长不、丞奉主”。从这些铭文可以看出,这3件书刀出产地明确,生产分工和程序清楚明晰。汉武帝时期,四川盆地在生产、生活和战争中广泛使用铁制用品,绵阳馆藏两汉100余件铁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四川迅速提高的经济文化水平也有赖于当时广汉郡和蜀郡发达的冶铁手工业。

两汉时期,由于漆器、瓷器和铁器等手工业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日显重要并逐步普及,而青铜制造业进一步衰落,青铜器在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但还是可以见到一些常用的生活实用器或专用冥器。绵阳出土的汉代青铜实用器多是壶、钫、耳杯、洗、釜、甑、镜等,以及马、摇钱树身等冥器。从铸造技术上看,实用青铜器素面厚胎,工艺不太精致。相反,冥用青铜器则工艺复杂、制作细致,如大铜马分头、颈、胸、腰和腿等九部分铸造,以子母口套合和钉孔连接,体壁薄至0.2厘米;摇钱树身由树干和叶片组成,一般有二三十个组件,有的叶片薄如蝉翼,纹饰丰富、雕刻精细,堪称这一时期青铜器中的珍品。

如淳注《汉书·贡禹传》说:“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据俞伟超和李家浩考证,“蜀郡工官最迟开始于武帝初年,创始于文帝以后至武帝初年之间”,认为和蜀郡工官相近的广汉郡工官其兴废时间也应相当^[5]。20世纪90年代,绵阳永兴镇双包山发掘西汉中晚期土坑木椁墓20余座,出土漆木器数百件。尤其是2号汉墓,出土漆器有马、车、盘、耳杯、奁、案、钵、扁壶、盒、碗、罐等,其中漆马、盘、耳杯数量均超过100件,漆盘数量最大,可辨器形达到200余件。木器有俑、牛、臼、灶、案、锤、璧、井、盒、梳、篦等,其中木俑和木牛数量较大,分别达到134件和30件^[6]。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朝鲜古乐浪^[7]、贵州清镇^[8]、江苏邗江^[9]、河南杞县^[10]、湖南永州^[11]等地汉墓中均曾发掘出“广汉郡工官”或“子同郡(王莽改梓潼郡为子同郡)工官”等铭文的漆器,且多铭记有八道以上的制作工艺流程和相应的工匠与管理者名字,证明广汉郡工官漆器生产工艺复杂,分工细致、责任明确,产品畅销全国。同时,从双包山汉墓和其他地方出土漆木器考察,广汉郡工官生产的生活用品制作精巧、色彩亮丽、纹饰优美。这些,见证了汉代绵阳地区高超的漆器生产技术和高度繁荣的漆器手工业。

经脉漆木俑,出土于绵阳永兴镇双包山2号汉墓,时代为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以前,是迄今世界发现最早的标有经脉流注的木质人体模型。木俑髹黑漆,高28厘米;体表绘有十余

[4] 三星堆博物馆、广汉市文物管理局等:《蜀风雄韵——广汉文物艺术精粹》,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3年。

[5] 俞伟超、李家浩:《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从成都市府作坊到蜀郡工官作坊的历史变化》,《考古》1975年第6期。

[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博物馆:《绵阳双包山汉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

[7] 梅原末治:《支那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日本京都桑名文星堂,1943年(转引)。

[8]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贵州清镇平坝汉至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9] 李则斌:《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文物》1991年第10期。

[10] 开封市文物管理处:《河南杞县许村岗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1期。

[1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州市芝山区文物管理所:《湖南永州市鸬子岭二号西汉墓》,《考古》2001年第4期。

道红色线条,被中医学史专家认为是绘制的人体经脉循行径路,与《黄帝内经·经脉篇》、长沙马王堆和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经脉佚书中的人体经脉记述颇多相近或相似,大连医科大学刘澄中教授、中国医科大学张永贤教授均认为,其价值和意义“堪与北京猿人媲美”^[12]。《后汉书·郭玉传》载,西汉晚期涪县有一号涪翁的老者,善针石之术,著有《针经》和《诊脉法》医书,东汉初和帝时的著名太医郭玉是其再传弟子。因此,经脉漆木俑出土于绵阳绝非偶然,也证明当时绵阳高度发达的经脉医学技术和取得的重要医学成就。

西汉和东汉中期,不仅贵族阶层奢靡和厚葬之风极盛,且“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地下”^[13],所以两汉文物是绵阳馆藏之大宗,都是出于土坑墓、砖室墓和崖墓,尤以绵阳和三台的东汉崖墓最富。这时期的陶塑以人、动物造型为主,日常生活用具模型为辅,大多是原真写实性的艺术品,可誉为绵阳古代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双包山西汉墓出土的陶塑人俑,可能是目前四川发现最早的陶俑。均为泥质灰陶,模制,高度在37~41厘米;通体施一层白色化妆土,复施彩绘,漆涂发髻,墨绘眉目,朱描双唇;皆为静立,着右衽长袍,束腰袖手。发饰两种,一种梳长发,垂至后背,下端挽髻,貌似女俑;一种平帻巾缠发,似为男俑。绵阳西汉陶俑风格写实,人体比例协调,衣饰刻画细腻,线条流畅,塑造风格与中原基本一致。

绵阳东汉陶塑题材丰富,艺术造型多样。题材多是日常生产生活中常见的人物和动物,陶水田、灶、屋、井、案等模型亦多见,这些陶塑在当时专作随葬冥器。人物陶俑可分两类,一类为生产中的劳动者形象,可称为田间劳作俑;一类为家丁、侍从服务者和倡优歌舞娱乐者形象,拟定名家事俑。田间劳作俑造型主要有提罐、执物、背负、击鼓、执扇等;多分男女,形象矮小,高度大多在20厘米以下,多数面目不清晰,制作较粗糙,似乎是社会最底层劳动者形象。提罐俑男性一般裸上身,一手提罐,一肩扛罐,女性多是两手分别提罐;执物俑多是执棍、箕、帚、锄等生产生活用具;执扇俑是扬扇鼓风脱谷物之壳渣。小型击鼓俑一般缩袖于肘,挽裤于膝,当是田间劳作号令或祭耕者形象。家事俑造型主要有带刀或带刀执锄俑、侍立俑、厨事俑、歌舞俑等,形体一般都很高大,衣着和发式较讲究,有的面部或衣饰有涂朱彩绘等,其衣饰、动作、用具等反映出是为富户从事家庭服务的社会阶层。带刀或带刀执锄俑,当是守家护院的家丁,农时亦参加庄园的生产劳动。侍立俑主要有拱手静立和行走两种造型,性别分男女,一般在30厘米左右,是家事俑中形体较小者。乐舞俑有说书、抚琴、吹笛、吹笙、击鼓和舞蹈等形态,当是《汉书·贡禹传》中的“豪富吏民畜歌者”,为富人日常娱乐和祭祀所用。

动物俑主要是家养六畜和鱼类水产。陶鸡、猪、狗、马等家畜模型最普遍,陶鸡分公母,子母鸡生动形象,陶狗或立或卧,造型各异;陶猪、马多作静立之状,惟妙惟肖。羊、牛等亦是可见但不太多的家养牲类。水产类的动物一般都是陶水田模型的附属品,鲢鱼、蛙、田螺、泥鳅、龟鳖,以及鸳鸯、鸭、鹅等。

陶房、水田也是当时墓葬中常见的专用冥器。陶房造型与绵阳崖墓雕刻、成都平原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上的房屋建筑样式、结构等基本一致,有单层和多层之分,有居家建筑和手工作坊(如舂米坊)之别,有的还有涂朱彩绘。陶水田多为方形或圆形,中间一般泥片或泥条间隔,附置有鲢鱼、蛙、田螺、泥鳅、龟鳖、鸳鸯、鸭、鹅等水生动物模型。

陶塑中,摇钱树陶树座和镇墓俑是反映时人精神信仰的两种随葬品。摇钱树座是汉魏摇钱树的组成部分,树身青铜,树座多为陶质,模制,造型大多略似山状,上小下大,中间为空心柱状,

[12] 刘澄中、张永贤:《扁鹊经脉医学·经脉现象与经络实质研究60年纵览》,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

[13] 《汉书·贡禹传》第72卷,中华书局,1962年。

高度一般在 30 ~ 50 厘米。树座表面浮雕图案,题材内容以世俗和仙界为主。前者有人物活动场景,如狩猎、骑兽、抚琴、跏坐、打钱等;有动物造型,如马、羊、猪、鹿、蛇、龟、狮、虎、象等;有树木、卷草等植物,还有矛、弩机等战争或狩猎工具,以及琴、几案等居家娱乐用具。后者有生翅的西王母、狮、龙、虎、羊、马、朱雀和羽人等,其实都是对世俗之物的飞天想象。研究者多认为摇钱树(包括树座)是当时人们追求财富、长生不死和升天成仙观念的表达,在今天也是珍贵的写实和虚幻相结合的艺术作品。镇墓陶俑一般是角状长耳、口吐獠牙、长舌挂颈,手缠长蛇或其他,显得面目狰狞可怖;但都是高大的人物形态,似乎是一戴面具的巫师形象,在墓中驱邪避恶,是死者灵魂的守护者。

绵阳的汉代陶塑技法多是模制,部分运用塑、刻、画等手法制作而成。题材多是艺术家身边和生活中所见物事,质朴生动,形神兼备;一些场景的塑造,如姿态各异的马群,小羊吮奶和狩猎等生活情趣浓郁,表现出写实的艺术风格。同时,陶说唱俑的形态动作、表情语汇和衣饰着装夸张中透着真实,又体现出一种肆意奔放的艺术格调,是汉代最具时代特征和审美价值的陶塑作品。

(三)

涪江依然川流不息。时光越过两汉,见证了魏晋南北朝 300 余年巴蜀地区割据分裂、战乱纷争和民族迁徙的政治风云,以及经济凋敝、民生艰难的社会生活。“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等,开创出 200 余年社会稳定、国家强盛、民生富庶的隋唐帝国,翔实的史料记载了绵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绵阳经济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今天,平武所在的龙州(府)、三台所在的梓州、绵阳和江油所在的绵州在这段历史的舞台上都有异彩纷呈的演出。有时,出土文物与历史的真实并不合拍,动荡的魏晋南北朝和盛世隋唐就是如此。绵阳馆藏千余件青瓷器充分说明,即使是动荡时代,历史的车轮始终向前,社会依然在进步,生产力依然在发展;而百十件陶瓷器和铜器藏品却承载不起李唐王朝泱泱大国的历史分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青瓷器生产和使用的鼎盛阶段,四川盆地发现较为普遍。从数量来看,绵阳是四川出土青瓷器最多的地区,馆藏近 2000 件。1995 年,在双包山 2 号西汉中晚期墓葬中发现 1 件青釉壶,灰胎,胎质细腻坚硬,敲击发出清脆之声,盖、口、肩腹和内底施有青釉,胎釉结合较好,不见剥落,“表明它是经高温烧成,与胎骨结合较紧密的高温釉”,是迄今四川发现最早的原始青瓷^[14]。到东汉晚期至蜀汉,青瓷器在绵阳才又有发现,两晋时期青瓷器开始大量出现,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增多,墓葬不分大小,都是主要的随葬品。隋唐遗物发现不多,但也有青瓷器。绵阳青瓷器主要有碗、盘、壶、罐、盏、钵、杯、盂、洗、坛等器形,也有黑釉和褐釉瓷器,器形多为壶、罐。青瓷碗、盘口壶、罐和盘等数量最多,延续时间长,已至隋唐时期。

青瓷器既简洁端庄、清新典雅,又经济实用,故得以广泛流行。优美的造型、丰富的装饰传达出时人的信仰追求和审美情趣,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有的瓷器也是精致的艺术品,如东晋晚期到南朝的龙凤盘口壶,青釉的造型秀丽、腹饰莲瓣,黑釉的圆润流畅,都是凤首高扬、龙嘴衔盘,是这一时期瓷器中的精品。西汉原始青瓷壶饰有弦纹、指甲纹和水波纹,肩部贴塑一对辫索纹耳,风格近似铜器装饰。魏晋至隋唐青瓷器,一般器物多饰弦纹、水波纹等,晋末出现的莲瓣纹在青瓷罐、壶、盘等器物上的装饰成为时尚,当与此时佛教盛行有紧密关系。

绵阳地区有烧造陶瓷器的悠久历史。2012 年 12 月中旬,梓潼县文昌镇莲枝村水厂工地发现

[14] 何志国:《四川最早的原始青瓷壶》,《四川文化报》1995 年 8 月 4 日第 2 版。

西汉早期至东汉时期的遗址。经过有限的发掘,揭露出与西汉广汉郡同时且与其有关的陶窑手工业区,发现陶窑 11 座,出土大量废弃的陶罐、钵、盆、甗、瓦、瓦当和地砖等生活用具及建筑材料^[15],与梓潼、绵阳等地发现的西汉墓葬出土陶器基本一致。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文物部门多次在江油青莲、九岭、方水、八一和涪城龙门等乡镇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唐代遗迹、遗物最为丰富的瓷窑遗址(拟定名为绵州窑)。从瓷器标本特征看,窑址上限起于东晋或南朝时期,下限到北宋时期。梓潼西汉广汉郡陶窑遗址地处北上中原、南达成都的交通要道,绵州窑遗址地处涪江西岸浅丘,都在当时的水陆交通干道上。因此,绵阳地区这一时期出土的大量陶瓷器可能不少就出产在这两地。

(四)

宋元明清时期,涪江岸边和金牛蜀道上的绵阳进一步发展,时为市境的绵州、梓州、龙州物阜民丰,文化昌盛。三台所在的北宋梓州发展为四川第二大商业都市,城郭雄伟,交通发达,两江交汇,千帆云集,通江达海,是川北最大的水运码头。平武所在的龙州南宋至元明时期改土归流,藏羌民族多有汉化。明代的“深山宫殿”——报恩寺是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宫殿式佛教寺院建筑群,是民族地区历史、建筑、文化、宗教和艺术遗迹的典型代表。清代中期,史称“康乾盛世”,绵阳迎来经济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江油中坝镇被誉为“小成都”,商贸交易异常活跃。这段时期,绵阳市境的考古遗存多见窖藏和墓葬,较为重要的窖藏宋代主要有平武龙安银器窖藏和南坝瓷器窖藏,现涪城区黄家巷银器窖藏,安县雒水和秀水的钱币窖藏,江油河西的铜器窖藏。元代有三台新西街以瓷器为主的窖藏。明代有现涪城区解放街和红星街、北川治城等地的瓷器窖藏。墓葬除明代平武王玺家族墓和现高新区永兴镇黎家院子石室墓群外,都是零星的一般墓葬。出土文物以陶、瓷、金、银、铜、铁和石刻等为主,特别是宋代三彩釉陶器、宋明金银器、元明青花瓷器和石刻等别具特色,富含历史人文魅力。

这一时期,陶器的数量大为减少,在生活中的地位大大降低,多见随葬冥器,如宋三彩和明清谷罐等。绵阳馆藏陶器以宋三彩和明代紫砂壶最具影响。宋三彩主要出土于涪江边的江油、绵阳、三台和安县,胎土灰白或红褐,低温铅釉,以黑、绿、黄三色为主。器形比唐三彩显得小巧工致、质朴简洁,器类以随葬冥器为主,日用器皿较少。日用器以三彩枕最具特色,多呈长方形,中间略凹,两端上翘,枕面和枕侧都刻画有人物、花卉等图案。专用随葬品主要是人物俑和动物俑,人物俑有劳作俑、文吏俑、武士俑和女俑等。还有两面人俑,前倨后恭的造型颇具意境。动物俑主要有鸡、狗、龟、龙、虎等。牛头人俑、蛇形人俑、双头蚕形人俑、美人鱼、天鸡、雷公、镇墓兽等陶塑造型别致,作为研究两宋时期道教盛行状况和丧葬习俗的重要实物资料而广受关注。绵阳馆藏 2 件明代紫砂壶出土于窖藏,皆有时大彬题名款。时大彬是明代万历时著名的制壶巧匠,2 件壶是屙砂紫泥制成、经高温烧造的陶质茶具,小巧细致,颇富人文雅韵,被视为时大彬紫砂壶的代表作。

宋代崇尚古礼,诏求古器,北宋晚期大兴仿造商周青铜器之风,绵阳、三台和江油等地多见窖藏,主要有瓶、觚、壶、盘、杯、筷、勺、尊、烛台、甗、鼎等,但器形较小,工艺较差,草率粗疏,远不及宋明金银器制作精美。

绵阳馆藏金银器时代最早的出土于汉代墓葬,器形均为手镯和戒指,素朴简单,基本没有装饰图案。1974 年和 1979 年,在现平武县古城镇先后发掘了 22 座报恩寺建造者王玺的家族墓,出土金器 129 件。金器的制作工艺主要有模压、钻刻、焊接、缠绕等,部分金器镶嵌有多种宝石,

[15] 本资料由绵阳市梓潼县文昌镇莲枝村水厂工地古代遗址发掘主持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万涛先生提供。

器形有发饰、耳坠、手饰、带饰、服饰、胸佩饰、龙形饰和压胜钱等，其中3件金发钗的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动态场景生活气息浓郁，令人称绝。一件呈山峰状，长18.8、宽6.3厘米，正面以楼阁庭院为背景，顶上缠枝葡萄，下部栏板雕刻云纹，周边环绕联珠纹。中部一人骑马，身后两侧各有一男侍从持扇相随，马前两侧各有一人提灯开道，马头前一人吹笙，一人起舞，两侧有乐队和侍者，或吹笛、或击鼓、或操琴、或弹琵琶、或托物品相随，近40人的活动场景生动形象。一件呈叶片形，长6.6、宽4.8厘米，正面饰园林建筑，前有围栏，栏下饰流水及龟；后有瓦房，顶缠枝覆盖。围栏与瓦房间金丝缠绕制成17人组成动感十足的“上马出行图”。中间一人头戴乌纱帽、蓄长须，身着圆领长服骑于马上；其后一女性高髻，身着交领服，正被两个侍从扶着上马，其余随从或举物相随，或作送行状，精工至极。一件呈“山”字形，长11.2、宽8厘米，正面围栏后两排人物，后排居中跏趺坐一长须老者，左手扶杖，侧立一捧果盘男侍，男侍身后一鹿回首望向老者；右侧立一捧茶盘侍女，后立一鹤，引颈向老者；两端均立一男一女侍从，女性持物，男性袖手拢于身前。前排男女侍从八人，均侧身向老者，或持物或拱手。这3件金发钗的人物形象和场景氛围仿佛就是王玺家族生前生活的真实写照^[16]。

银器主要出土于现涪城区黄家巷窖藏^[17]、平武龙安镇武庙口窖藏^[18]和王玺家族墓^[19]。黄家巷窖藏有“崇宁通宝”铜钱22.5千克，银器35件。银器数量虽少，但品种较多，有茶托、盘、碗、盏、壶、瓶、盆、盒、鼎和耳环等，大部分都是生活实用器。盘、盏、盒、碗等多种折枝花卉、菊花和凤鸟等纹饰，鼎和瓶等有蟠螭纹、三角云雷纹、蕉叶纹等仿古纹饰。龙安武庙口窖藏有葵瓣盘、梅花盏等生活实用器和束发冠、花枝等饰物。银盘内底篆刻骑者出行、侍从相随，或园中漫步和闲谈的画面，饰有楼台、亭阁、树木、花草，配以诗文，诗书画融于一体，文雅恬淡的意境呼之跃出。银盏构思奇巧，把梅花枝形和器物造型相结合，形成天然花枝状。王玺家族墓出土银器49件，多是装饰品和小型生活用品，主要有簪、耳坠、戒指及纽扣、带饰、耳勺、牙签和粉盒等，以簪子最多，达到26件。形制多同于同类金器，簪子头部不同的花瓣状，戒指有葫芦形和瓜形，托周装饰联珠纹和绳纹。金器和银器的制作工艺相差无几，都比较复杂精细。银器成型工艺主要有模压、钻刻、焊接、钎接等，金器还有缠绕工艺；纹饰主要有线刻、刀刻、篆刻、压印和捶打等工艺。贴近生活的金银器制品和独具匠心的精湛工艺，反映了宋明时期民间高超的金银器制作工艺水平。

这段时期，绵阳馆藏数量最多的是瓷器，都是日常生活用品或陈设器物。宋代影青瓷和黑釉瓷，以及宋元青瓷都较为精彩，明代青花瓷器是主流。另外，还有少量的钧窑和定窑等宋元名窑产品，也有邛崃窑和广元窑等唐宋时期的地方窑口瓷器。宋代影青瓷主要发现在平武、三台和绵阳，多是碗和碟等日用器皿。胎质坚致白腻，壁薄透明，釉色青白淡雅，釉面明澈丽洁，釉里藏花，多见莲花、菊花、水波纹和云纹等印花。游仙小枳沟出土的元代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碗，三台出土的宋代梅青莲瓣纹碗和元代龙泉窑豆青吉字瓶、元代粉青双耳垂环瓶等是这一时期绵阳最为精彩的青瓷器，胎质坚硬灰白，釉色青翠欲滴、温润如玉，被认为都是当时青瓷中的上品。江西宋代吉州窑生产的黑釉剪纸贴花碗出土于三台和绵阳，剪纸贴花是仅见于吉州窑的装饰风格，其“兔毫”、“油滴”、“洒釉”等窑变色斑更是黑釉瓷中的名贵品种。

绵阳馆藏最早青花瓷器出土于三台城西牛头山下一元代窖藏。该窖藏发现于1992年，出土瓷、铜、铁和锡等较为完整器物24件，包括2件元代青花瓷器，即菊花纹象耳垂环瓶和缠枝

[16] 张才俊：《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文物》1989年第7期。

[17] 绵阳市博物馆：《绵阳市出土宋代窖藏银器、钱币》，《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18] 冯安贵：《四川平武发现两处宋代窖藏》，《文物》1991年第4期。

[19] 张才俊：《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文物》1989年第7期。

牡丹纹鼎式炉。元青花瓷器胎体白洁，釉色青白，纹饰满绘于身，多用莲瓣、蕉叶、菊花、牡丹、古钱和卷草等，象面瓶耳和虎面炉足是勇猛、剽悍的蒙古族人性格与宗教信仰的写照。经发掘者研究，这几件瓷器是元代景德镇所产的青花精品，是当时蒙古人赠送给寺庙之物，后因战乱而被僧人窖藏。

到明代，绵阳多地发现以青花瓷器为主的窖藏^[20]。1973年，在现涪城区解放街绵阳军分区基建工地发现200余件青花瓷器窖藏，器类有碗、罐、杯、高足杯和三足炉等，婴戏碗和云鹤杯底部分别书有“成化”和“宣德”年款。1986年，在现涪城区红星街窖藏出土青花瓷器351件，器类有碗、盘、杯、高足杯、罐、瓶、盒、钵等，其中款识瓷器达到64件，赤壁赋碗分别书有“永乐”和“天顺”年款，杯书有“成化”年款。在三台和北川等地均发现有瓷器窖藏，多见“成化”年款，亦见“永乐”、“宣德”和“正德”等年款，器类也以碗、盘、杯等常见。除王玺家族墓外，明代一般墓葬中随葬品很少，青花瓷器仅是零星出土。王玺家族墓中青花瓷器近70件，类型较为单一，以盘为主，另外有少量碗、洗等。这些青花瓷器胎质大多致密洁白，釉色淡雅，纹饰有诗画山水，更多的是花卉、人物、动物、蔬菜、昆虫等现实题材，充满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研究者多认为即使是明代早中期年款的瓷器，也是明代中后期的造型、胎釉、青花料和装饰特征，是民窑伪托前朝年款的明中后期青花瓷器，推测多是景德镇民窑产品^[21]。

馆藏石刻以明代墓葬石刻和清代墓前碑刻为主。宋元碑刻以《颜氏干禄字书碑》和《赵府君墓碑》最为知名。前者是全国现存唯一的宋刻颜氏干禄字书碑，后者集元代三位名家文章书法于一身，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宗教石刻以绵阳西山玉女泉出土的隋“大业六年”（610年）纪年题记的道教石刻最为珍贵，是四川现存最早的道教摩崖造像。在绵阳地区，宋元墓葬多以石室墓为主，但石刻少见。宋代墓葬雕刻常见的是在墓门浮雕柱梁、斗拱等仿木构件造型，上部雕刻双手持斧的武士，下方裙板雕刻如意等图案，墓室壁板雕刻家具和陈设器物，笔画简单粗犷。元代墓葬极少，游仙区小枳沟镇曾发现一座元代石板墓，仅在部分构件上雕刻花卉卷草等。

在明代，石室墓发现较多，但规模大、有雕刻的极少。成规模的只有20世纪70年代平武王玺家族墓群和2009年高新区永兴镇黎家院子墓群，都有墓室雕刻。平武王玺家族墓和游仙区的明代兵部尚书金献民墓有墓前神道石刻，但前者保存很差。

绵阳明代一般墓葬石刻内容多是瓶花、福禄文字和麒麟、梅花鹿等瑞兽。花卉雕刻凹凸有致，质感厚重；瑞兽雕刻简洁，富有生气，最有代表性的是黎家院子墓群。黎家院子发掘27座墓葬，是目前绵阳乃至四川规模最大的一处明代墓群，以石室墓为主，9号墓还发现了“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纪年。出土文物不多，以工艺粗疏的陶瓷器为主，墓室石板多雕刻涂朱的花草、瓶花、建筑装饰、居家活动和生活器皿等。

王玺家族墓和金献民墓都是官宦之家的墓葬，雕刻内容和艺术风格与普通墓葬有较大差别。不完整统计，平武王玺家族墓石刻浅浮雕147幅，彩绘壁画32幅，规模宏伟，内容丰富。雕刻彩绘有墓主、男女侍从、文官武吏、仙女飞天等人物，古铜钱、金银锭、犀角、珊瑚和玉版等珍品，灵芝、荷花、牡丹、芙蓉、芍药等瓶花，“寿”山“福”海等图语，双狮、麒麟、仙鹤等奇禽异兽，描绘了墓主人生前奢侈的世俗生活、喜好的吉祥图案和臆想的仙人天界等，堪称四川最精美的明代墓葬雕绘艺术珍品^[22]。浮雕和彩绘壁画技巧熟练，比例协调，形象准确，线条流畅，变化多端；色彩以大红、朱砂、赭石、石黄、石青等矿物颜料彩绘渲染，可谓匠心独运。同时，人物的发髻、

[20] 景竹友：《三台出土元代窖藏》，《四川文物》1993年第6期。

[21] 参见何志国：《试论窖藏明代年号款青花瓷器的年代和窑口》，《四川文物》2000年第6期。

[22] 张才俊：《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文物》1989年第7期。

饰物、衣帽、动作等均因身份或职责不同而相异，特别是侍立人物手中所持珍珠、珊瑚、灵芝、龟、鱼、蛋、果品、镜、奁、盒、壶、瓶、扇、书、砚及兵器，达16样之多，几乎全方位立体化地模拟出明代仕宦人家的生活场景，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和艺术鉴赏价值。金献民墓前石刻均为圆雕，现存有石马、跪羊和执剑武士等。石马刻画细腻，石羊雕刻简练，武士高大英武，气势逼人，反映出不同的石刻艺术风格。

馆藏清代石刻数量较多，都是最近十余年公安部门打击文物犯罪过程中收缴移交的石刻文物。清代墓葬流行建造墓前碑刻，俗称“花碑”，多呈仿歇山顶或庑殿顶的石质建筑，分别由屋面、盘龙柱、花板、抱鼓石、碑板等组成，主要雕刻盘龙绕柱、石狮抱鼓、戏剧人物、故事传说，以及龙凤、瑞兽、花草、挽联、碑文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绵阳馆藏宋至明清时期的墓葬石刻，内容丰富，雕刻精美，是研究这段历史时期丧葬制度、社会伦理、造型艺术，以及绵阳民俗、建筑、戏剧、服饰和书画等方面的珍贵实物资料。

(五)

书画和碑帖是绵阳馆藏大宗文物之一，贯通古今，展示了蜀中山水蜀中人和绵阳深厚的自然与人文积淀。

绵阳是李白、欧阳修、文同和李调元等文化巨匠的故土，是王勃、杜甫、李商隐、陆游、杨慎等文学巨臂留恋盘桓之地，激发出古今艺术家气势磅礴的诗情画意，不断挥洒出熠熠生辉的传世之作。绵阳馆藏字画时代最早的仅到元明时期，但都为名垂青史的大家之作，如元代倪云林和明代沈周、祝枝山、仇英等。清至现代的举世名家作品则收藏颇富，如傅山、傅抱石、翁同龢、赵熙、谢无量、张大千、丰子恺、石涛、潘天寿、李苦禅、于右任、林散之、郭沫若、吴作人、沙孟海和吴冠中等，亦有诸多地方名家如张船山、孙竹篱、赵蕴玉等的作品。他们的作品风格纷呈，造诣深湛，在中国各个时代的书坛画界达到了非常高的艺术境界，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的傅山行书《左思·咏史十条屏》，笔意浓厚沉着，行笔壮观，浓淡急徐，自成一统，是难得的傅山精作。被誉为20世纪十大书法大家之一的谢无量，博古通今，书法气宇轩昂，超逸不凡，独树一帜，卓然成家，绵阳馆藏其作品当引以为豪。林散之是诗、书、画三绝震撼中外的艺坛大家，尤其草书从其审美观到形式技巧都对国内外书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留存绵阳的对联和条幅见证了他对中国现代书法艺术的巨大贡献。

元代倪云林的《幽亭秀木图》表达了其不惑之年沉郁落寞的心境。明画第一的沈周，遗留绵阳的《秋山图》当是至宝。擅写人物、山水、花鸟、楼阁和仕女的仇英，与沈周、文征明和唐寅被后世并称为“明四家”，绵阳馆藏其《亭台楼阁图》，形象秀美，神采飞动，刻画入微。傅抱石是开宗立派的一代艺术大师，人物以形求神，线条凝练劲健，绵阳馆藏《李白像》，堪称其毕生精品。受教于徐悲鸿和齐白石的李苦禅擅画大写意花鸟，馆藏《白鹭图》、《乌鸦图》继承了民族绘画优良传统，并融中西技法，阔笔写意，气势磅礴豪放，画风质朴洗练，风格独特鲜明。名冠中外的张大千，“包众体之长，兼南北二宗之富丽”，亦为绵阳留下了《太白行吟图》。吴冠中是又一位现代中国的杰出画家，他为绵阳留下的《峨眉山月思李白》，表达了对李白的崇敬和对蜀山蜀水的仰慕，具有极高的文化品格。

绵阳馆藏碑帖中，以墓碑、墓志、塔铭石刻拓本为主，另外还有汉阙、摩崖石刻和寺庙碑刻等拓本。这些碑帖的原碑出自全国各地，且有不少名碑，有的原碑早已不存。这些碑帖经过整理研究后，是补阙证史和研究文学、文字学、经学、宗教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更是研究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